

返鄉 / 移居 - 農村創生交流會

探索農村的可能性、思考農村的未來性

宜蘭場：前瞻農村的未來

時間：2018 年 10 月 28 日(周日)下午 13:00~17:00 (備有簡易茶點)

地點：美虹廚房 / 宜蘭縣員山鄉尚深路 124 號

分享者	主題
賴青松 / 穀東俱樂部	從深溝經驗看農村發展的文化與價值
楊文全 / 倆佰甲	在開放式創新浪潮中探索農村發展的可能性
蔡晏霖 / 土拉客實驗家園	農村不是我的家？新農的困境與突圍
鄭雅孺 / 在南方澳的海味生活	移居討生活 - 我在南方澳的海味人生
	提問與討論
<p>[網路文宣]</p> <p>談到返鄉務農，宜蘭儼然是台灣的指標區域。然而，來去農村討生活，已不只是個人選擇問題，更關係著對「新農村」的想像力和行動力。</p> <p>如何既不浪漫化返鄉務農或移居生活的美好，但又不失去農村的創新可能性，這之間的價值立場和行動策略，需要有更多的經驗交流和思維對話。</p> <p>在這個交流會中，我們試圖透過不同世代的返鄉者和移居者經驗，共同探索未來農村創生的課題與可能性。</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聽聽賴青松所謂的「打造新農村文化，讓沒有界線的農村與世界更加緊密往來」；● 了解楊文全如何藉由「破壞式創新」的概念，開創與舊農村體系不同的生活社；● 讓蔡晏霖引導我們從實驗農家園的經驗解讀新農所面對的困境和如何突圍；● 看看移居南方澳的鄭雅孺，如何在挖掘地方漁業故事的過程中，面對漁村生活的你來我往。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開場說明本系列交流會的源起和目的(略)

穀東俱樂部 賴青松

過去的生活讓我會對自己質疑，難道青春就要浪費在這種事情上。穀東俱樂部是一種冒險，也是一種實驗。(先看影片：[Home Run Movie](#) | 發亮 | 賴青松)

今天聚集在這裡的可能都是關心農村創生議題的朋友，但是剛剛看仁志所介紹的目前政策由上而下所關照的課題，老實說我一點都沒有感覺。因為我從來不是這樣思考的人，否則我就不會在這裡種田。那是一種從上而下，從全球規模、國家、地方，幾乎是一種上帝的視角來看待怎麼把農村發展起來。但對我個人來說，我沒有辦法愛上這樣的東西。

深溝經驗很有趣，我也喜歡過這樣的生活，從一開始只有自己來到這裡種稻，然後忍受同村的親戚的嘲諷，因為用這種方式和價格進行產銷的米，對原本的在地農人打擊很大。但是，時代站在這一邊。不過，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讓我領悟到一件事：「學種田，要先學做人」，否則在這邊大概沒有辦法活超過三年。那時我還有綁馬尾，後來剪掉了。大家都在看，你還能夠撐到何時？

對我來說，回到都市生活的吸引力不大。因為在我三十歲搬來深溝之前就很清楚，我不喜歡住在都市，喜歡住在鄉下，而且希望我的小孩能有一個可以叫做故鄉的地方，這是我最大的希望，跟剛剛所介紹的那些政策目標通通沒有關係。只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動機，就是我愛這樣的生活。所以不用給我補助款、獎勵金這些東西，我就是愛上它。但是如果拿了補助款，叫你跟一個不愛的人結婚，會有誘因，可是等錢花完之後，就會想不如離婚算了。

世界上很現實的一件事就是，用錢不能買動機。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國家這個好意是錯的，因為其實很多人是沒有談戀愛就結婚的，覺得人家就比較有資產就可以湊合了，然後三年之後也許就幸福美滿了，也有可能。所以，我始終都沒有覺得深溝村的經驗是唯一經驗，但是深溝村的經驗是由這裏產生出來的經驗，是會讓你相信，在這個年代即便你一無所有，像賴青松一樣，沒有資金、經驗、土地，一樣能回到土地上過一個他有尊嚴的生活，他就只有證明這件事情而已：「只要你真心所愛」。這個事情其實應該是前提，但是很難驗證，因為很少人知道什麼叫真心所愛。

簡單說，深溝村走到今天，從頭到尾賴青松就只是在解決賴青松自己一個人的問

題，雖然後來產生某些社會上的波及效應，從國內到國外，但事實上還是賴青松他家的問題。2004 年，穀東俱樂部開始，我只面對一個問題：「我想回到農村生活」。2000 年我就回到深溝生活，發現務農是非常幸福的事，但如果拿來當生計基礎，這是最世界上最淒慘的工作，看天吃飯、非常不安定。

我小時候的經驗讓我對經濟不穩定有非常大的恐懼感，所以我就決定考上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離開這個我覺得可以圓夢的地方，跑到日本去念書，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他山之石。總而言之，就等於再當一次兵，而且是日本人出錢，很好。兩年之後，到底我愛誰？我口袋裡面拿出來就只剩最後一張牌叫「農夫」，其他能想到的、我有興趣的，我都做完了。當過森林小學的老師、研究助理、翻譯，也做過綠色消費、主婦聯盟，連種樹挖水池當園藝工人我都做過了，每項都做過但每項都不合。

回過頭來談，1995 年我 25 歲，當時就有想過要當農夫，所以在日本實習。因為那時就算再笨也知道，馬上回去當農夫只有死路一條。我沒有想過退休這件事，但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當農夫，應該是幸福的。但我要弄清楚，農夫怎麼把東西賣出去。在台灣找不到好的模式，我去日本找，去神奈川的生活俱樂部消費合作社實習。之後回到台灣，過了兩到三年沒日沒夜的生活，當時給我很大的幫助是，因為認識台灣第一代跟 1.5 代的有機農夫，他們在台灣沒有有機認證的那個年代出現了，是我後來能夠挺進農村最大的顧問，也都是我現在的好朋友。在農地上能夠交往的好朋友，都是一輩子的，那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件事。

1998 年離開主婦聯盟之後，到 2002 年我明白在主婦聯盟大概只有我一個人受過生活消費合作社這麼完整的訓練，所以我把當時看到的事情就寫成書，對台灣社會和日本有個交代。

2004 年回來當深溝村當農夫，想要給孩子一個故鄉。那時就開始在面對，其實產銷失衡應該是全世界農家在面對最大的困境，因為是看天決定。穀東俱樂部、預約訂購、計畫生產、風險分攤，幫我解決這個問題。我不是想到就解決，而是我下去實作之後，以事實證明他可行。穀東俱樂部大概就證明這件事情，成為華人世界第一個 CSA 的案例，甚至也是台灣第一個群眾募資的案例之後，當年雖然沒有這些詞彙，但它根本就是在運作這些概念。

穀東俱樂部的時期就體會到，很多人不是衝著稻米來的。很多人心中有農村夢，但是他無路可循，如果我走在最前面，不應該把門關起來，應該把後面的路，甚至設立路標，讓後面的人更容易進來，因為我覺得農村應該是挽救人類現代失速

文明的力量。所以，種了兩年田又寫了一本「青松 e 種田筆記」(2007)。剛開始種田的時候是最有感而發的，現在只剩下牢騷可寫。

五年之後，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我意識到我家有飯吃、社會也能接受，但是我可以預見二十年後我還是深溝村最年輕的農夫，我就會死路一條。因為在有機耕作的過程中，必須不斷依賴村裡的人力協助，因為農業的機械化沒有辦法完全取代人力。當我在三十歲雇用六十歲的，四十歲雇用七十歲的，我想我五十歲時不能再雇用八十歲的，就算他肯，他的兒子也會拿菜刀來砍我：「你敢讓我母親下田就試試看！」

我想，後繼無人，我又遇到全世界農村都面臨的問題。我想了很多辦法，連先騙小孩下田，以食農教育成立深溝農民小學，設想他現在六年級，六年後成為高中生，那時候如果青松阿伯去拜託他幫忙打工下田，他應該不會拒絕，這種方式我都想過了。然後也想方設法，租用空的田地、房舍，引進很多年輕人，甚至各式各樣的人力進入村裡，包括當時的倆百甲、土拉客，這些都是我當時的穀東朋友。在這樣的狀況下，會發現即便已經有一個穀東俱樂部的模式進場，但還是很難生存，因為每個人的個性、屬性通通不一樣，這對我來說很意外。

在推動深溝小學的時候，這當中我安排了一個伏筆，讓村子裡的陳主委，當時還是慣行農夫，我知道他心裡有著有機耕作的種子，不斷地來找我說他也可以操作，但我可不可以幫他賣米。但我沒有讓穀東俱樂部進行這樣的操作，因為這不在我的規劃當中。因為我覺得每個農夫都應該成立自己的品牌，成為自己舞台上的英雄，不應該去幫別人背書，變成一個大農，這對我來說沒有意義也有困難。所以，成立「深溝農民小學」之後，讓陳阿公去帶這些孫子輩的，讓孩子知道這個看起來什麼都不懂的阿公，其實他一輩子的農業、農耕的功夫，是值得眾人期待，而且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老師。後來陳主委也成在宜蘭社區大學的合辦之下，已經進入第五屆夢想青農學校的老師。前兩集的「米米之音」所採訪的夢想青農學校學生，我覺得非常感動，因為有許多原本跟這個有機農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但是無論來自哪裡，在這個地方都找到一個可以回到自己人生真正家鄉的一條路。這不是一個人就可辦成，是一群人的眾志成城。「農民小學」雖然沒有辦下去，但跑到學校裡變成食農教育的開端。後來這個過程也寫成一本書，應該是全台灣第一本以現場一年完整食農教育的實際紀錄。日本的學者來看也說，日本的食農教育走的比台灣前進，但在一個學校、一個據點、一個計畫上面花這麼多心力紀錄的，絕無僅有。

當時簽到倆佰甲，對我來說等於是中獎；簽到楊文全這一支獎後才發現，原來網路時代的群聚效應，跟我原來想的單一計畫模式不一樣。像我之前用的「一分地農夫實習計畫」，當中有楊儒門先生來過；也弄過「農地小學計畫」，兩年後變成父母在做，小學變成大(人)學。我試了好幾個補充人力的方式都沒有成功。一直到楊文全出現後，當時他是我的穀東，後來他說他退休了，希望能夠到這邊生活和工作，所以我就給了他地，到最後變成被宜蘭縣政府找去當農業處處長，也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地保衛戰。他來之後接下來就變成倆佰甲之後的歸農時代。當時他從網路上海選、海撈，那對我來說是壓力很大的，因為我等於是把地主對我的付託、信任，去託付在我完全不認識的人。如果是交給我找來的人，我可以接受。但是交給我都不認識的人，昨天才出現在我家，背著小孩、台北工作還沒辭掉、還有高血壓、太太又有什麼狀況之類的人，這個我受不了，還沒把田租出去我的高血壓就快發作了。還有像這種背著小孩下田的，我心裡都要打個叉，我可以害自己不能害別人。

但是到最後會發現，就只有這些人到鄉下來，是這群即使背小孩都要下田的人挽救了農村。我忘了當年我來農村的狀況也是如此。但是當我變成村子裡的老農代表時也會出現這種態度。可是，真正夢想的實現通常就是在你認為不可能的時候。當時我沒有接受這群人，但楊文全的倆佰甲就一口氣通通都接納了。昨天在我家門口被我碰軟釘子的，隔天我在田裡看到，問他怎麼會出現在田裡，這不是楊大哥的嗎？他回我說：「楊大哥說做田很簡單，三通電話就解決了。」那一刻我決定吞下去、走回家。回去馬上找楊文全，跟他說：「這個人要是出問題，我馬上唯你是問！」

這樣的人越來越多，產生一個半農半X的志願農民組合，後來在這個人口外流已經到臨界的農村當中，產生了這樣租來的田地、租來的房舍，甚至到工具都可能是借來的，只有自己心裡的動機和初心是每個人都要自己長出來的，只有那個東西才能幫助你在農漁村的土地上深深扎根。所以，每當你疑惑或深深挫折、走投無路之時，回到源頭那個初心，當初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從穀東俱樂部 2004 年到 2015 年當中，你問我回返初心多少次，這用佛家的話來說叫「不計其數」，永遠在那裡問，為什麼我要在這裡。這種的疑問，一輩子都會來。

在無形當中，那個在農村中原本很綿密的人際關係所建構起來的那一個土地交付的代耕系統，就在穀東俱樂部和倆佰甲的相輔相成之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緩衝帶。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2013 年，倆佰甲成立，文全來要兩分半的地，我手上有兩甲半的地通通丟給他，只給他一個晚上決定要或不要，之後他就吞了。第

一年找了六個人，第二年變成十二個人，第三年、第四年到現在有名單的就超過一百個人，我才知道群聚效應在網路時代要的是「海選」。但是後面的支持系統，我們確實是且戰且走，摸著石頭過河。

這樣的一群人，需要一個據點，共生共存，然後會發現這些都市來的農夫，每個人都笑到讓你看見牙齒跟牙齦。這樣據點的出現，空間的佔領跟保有，讓這群新的農夫能夠在農村中紮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1 世紀的農夫需要 21 世紀的廟口、柑仔店，跟夜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這邊已經產生好幾對的情侶，上個月有一對台灣與香港的人來這裡種田而認識的結婚了。所以，這裡不但沒有找不到伴侶的問題，反而因為土地的孕育來這裡就生出小孩了，這是大地療育的力量。

到現在為止，又出現第三個困境，叫做「農村不是只有農民的農村，農村是百業齊放、百工共生的農村」，不只是農業，還要有農周邊，要有理髮店、農具店、有機資材店，甚至還要有夜店，不然這些年輕人回來晚上要到哪裡去聚？接下來只有農地是不夠的，還要有「農空間」。村子裡面新的房子貴到碰不了，舊房子我們通通都找，能租的先租，租不了的，覺得價錢可以就買下來。從租田地到佔田地，再到最後我們打算佔領這個村子，因為我們喜歡這個生活，如果他們的子孫都不要，我們決定把這裡佔下來，活下去。我想到這個階段，如果讓農周邊可以再重新復興、繁榮起來，成為一個農藝復興的時代，其實應該就快接觸到國家政策了。

還有一個插曲，甚至連村子裡的信仰中心「三官大帝」都成為一個媒介，因為田裡的休耕地在多年沒有人祭拜之後，土地公跟老大公就透過三官大帝找上這群新來的農夫。簡單說，連村裡的神明都決定「不押地主押佃農」，你們的子子孫孫都不再回來了，請問如果作為一個神明會不會焦慮？很難有人想像，三十年後如果沒有農夫還會不會有人拜土地公？祂看你們這三年來在這裡做事，出出入入我們也都有保佑，以前的農夫都會按照時間去祭拜，你們是不是也應該來祭拜我們一下。這件是在 2015 到 2018 年，從春耕祈福到秋收的感謝，基本上我們就在村子老主委的指引之下，一直做到今天。我想這在台灣的鄉村裡頭應該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個案例，新來的、外來的農村移民成為新的祭祀圈在這村子裡面運作。

我想，到最後的決戰點應該是農地的制度，農地不該是商品。在農村生活的人，農地是必需品，像空氣、陽光、水一樣的存在。但是對於現在的市場經濟來說，農地被迫成為個商品，這樣才能帶動經濟活動、景氣活絡、GDP 成長。其實是國

家把自己困在這個兩難的困境之中。但是在這之中，「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大概在最後這個地方要接在一起，這是我目前看見的第四階段。

從產銷失衡、後繼無人、百工齊放農藝復興，再來才是普遍農漁村所面對的困境：「農地到底是聽國家的，還是聽農民的？」

倆佰甲 楊文全

我先從結論講起，「如何透過開放式的創新讓農村發展有所可能」。這張半農興村的圖，是我們來了這一年後，田文社的 Ova 畫的農村景象。倆佰甲所做的事，是剛剛青松所提到，在那時如何讓「愛上農村」的一群人，進到這個

先前仁志介紹的那些內容，我從三十歲到五十歲都是在那樣的簡報中過日子、討生活，發現我實在是走不下去，因為我搞不清楚這樣的事情要連接到賴青松這樣的狀況，要怎麼銜接起來？就像剛剛青松所說，因為缺乏動機所以無法動起來。我今天的內容也是在回應當初為何走不出框框的原因。

在仁志的簡報中談到一個「地方接納體系」，我認為這個地方接納體系必須是開放的。就像大家所使用的臉書，他是一個開放平台，只要登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臉書的使用者，雖然還是有一些基本規範不能逾越，否則就會被封鎖、停權，但一般人在使用臉書可能就很自由。我今天是我過去這五、六年的經驗來回答「地方接納體系」這一題而已，其他的部分沒有辦法回答。

當我們要讓一群愛上鄉村的人，而且可能是沒有農村經驗，跟這個村子可能也沒有關聯的，就像我們這樣。這樣一群人，來自都市、習慣都市生活方式和文化，和農村有非常大的落差，但要如何銜接在一起、如何進來。此外，這群人來自四面八方，成長背景不一樣，對個人和社會的看法都不一樣，這樣的一群人如何可能在這個地方共存？但深溝村就是這樣的地方。大家可以在剛剛青松所播放的影片中看到一種生態系，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如何形成？就是這個地方接納體系必須是開放的。

基本上，倆佰甲是一個平台。當然，我現在所說的事情都是事後的解釋。剛剛青松也有提到，他那時塞給我兩甲半的田，可是我怎麼可能自己做得起來，所以我就去遊說別人，說種稻子這件事很簡單，只要自己把草拔一拔、福壽螺撿一撿，你就有自己的米可以吃喔！多迷人阿。一分地，最忙的時候一天只要花半個小時就可以了。而且只有從二月到四月，或是三月到五月而已。其實是因為那年我也是第一年務農，沒有經驗所以就隨便亂講。不過初期還是有一點經驗可依靠，像

青松和其他夥伴的田間協助，總之我是把它想得很簡單，其實也蠻簡單的，只要有足夠的經驗協助，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就可以。

什麼是開放呢？倆佰甲在那時從青松手上接了很多田，我就這樣遊說我周邊的朋友，也有些被青松打槍的就跑來找我，因為他知道我這邊在找人，雖然我都不認識他們。進來之後，發現我們好像可以做這件事情，協助大家進場。2013 年是第一年，其實倆佰甲有兩位創辦人，還有另外一位，但我要得到他的同意才能說他的名字。那時的情況是我手上有兩甲半、六戶，但另外還有五戶，跟這兩甲半沒有關係，但大家是一起開始的。我們從插秧到收割那天，經歷著非常痛苦的過程，產生很大的爭議。

因為這群人有十一戶，有時候一戶兩個人來開會，所以開會有十幾個人。其實我是城鄉所畢業的，也很擅長開會。那時候我們每兩、三周開會一次，每次都要開五、六個鐘頭，討論議題但都不會有結論。拍桌子、吵架、掉眼淚等等ㄉ都有出現過。那時候產生一個問題，就是這群人該怎麼一起相處。對我來說，從我這邊進來的夥伴就是來幫我解決田地裡的問題，我是想比較簡單。但有人會思考說，覺得這群人是在農村蹲點的社會運動團體，內外之別很清楚，誰是倆佰甲的成員、誰不是。但對我來說，因為在開始種田之前，我已經在宜蘭待了十年進行農村規劃的工作，經常去找青松，他是我很重要的農村顧問，還有跟很多小農朋友都認識。

突然之間我要開始種田了，這對我的人生是很大的轉折，然後還遇到另外五戶我過去都不認識的人說也要種。這些就變成「倆佰甲」的夥伴，但又說青松不是同一夥的。可是，明明田地都是從青松這裡來，那青松到底是不是倆佰甲的成員？美虹是不是呢？對我來說，不可能會有那條界線。但我們裡面就有成員會覺得，這是我們一群人，我們必須形成很高的共識，除了友善耕作是從一進來就是基本要件外，之後就是討論出來的。其中有一件重要的是，在倆佰甲所承租耕作的兩甲半之中，包括我在內的六戶所認領掉的是 1.2 甲，剩下的 1.3 甲沒有人認，就是我來顧「公田」其中的八分地。公田的運作是大家也會一起去勞動、除草，日常巡田就有 2-3 個人協助，因為公田離他的田區可能比較近。

從我這邊進來的，大部分都是很單純的農村夢，工程師、建築師、休學學生等等，其中一位就提到公田要不要做農藥檢測。另外一群是帶著社會運動想法而曾經在台北街頭狂飆的人，就會說「不要中了資本主義的陷阱」。怎麼辦呢？我兩邊的意見都聽得懂，一邊說要因為要對消費者負責任，一邊說是資本主義的遊戲所以

不行。我事後都要每戶去拜訪來處理大家的心情。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開放創新」，因為網路時代的力量是來自於開放社群，像臉書這樣，大家互相不認識卻都是臉書的使用者，讓臉書大到可以和 Google 一起幾乎壟斷全世界的廣告市場。這就是網路時代的重大力量。

而在倆佰甲運作的過程中，就會辯論起倆佰甲的理念是什麼？我就提到我的想法是，希望藉由倆佰甲來協助新農夫進場。那時候就在想，如果一年能協助五戶進場，每戶兩甲地，一年十甲，只要二十年，從我五十歲到七十歲，這樣就倆佰甲了，並不是達不到的。而另外一邊的想法就會覺得「老農」比較重要，我們要影響「老農」。我那時在想，在場的大家都是新農，結果是提老農比較重要，新農不重要，這就讓我抓不到頭緒了。結果就變成什麼事情都無法討論，不管什麼社會議題、對農村的想像等等，都無法討論。那到底需不需要討論，我們這群人有需要形成共識嗎？在這過程中我也被拍桌子拍了兩次。我在想，種田而已啊，何必呢？應該是快樂的，誰想要來開會都可以啊。但另外一群人可能會覺得，誰誰誰不是倆佰甲的就不能進來開會。

我們之中大部分是反核的，但也有人「理性擁核」；我們大多數是支持「多元成家」，但也有人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怎麼談？後來就面對大家，覺得不可能談。很多進來的是 30-40 歲，基本上大家都不想改變。就像今天叫我去灑農藥，怎麼可能？那要叫老農不要灑農藥，怎麼可能？那老農灑農藥有問題嗎？沒有，那很重要阿，因為台灣的糧食安全目前都還是靠灑農藥起來的，因為要量產就要長得很密，長得很密就必須靠施肥，然後病蟲害就很多了，所以需要農藥。

基本上，所謂的「開放式創新」就變成什麼都不能談。我後來發現，即使是有公田關係的這五戶，大家怎麼一起幫忙處理儲存、碾米、銷售的問題，有一位成員很認真地熬夜畫了一張流程圖，第二天跟我講解，我聽了五分鐘就聽不下去了，因為彼此的邏輯無法相容。每個人的腦袋中都一個強大的邏輯，但每個來到農村的人，他敢拋棄都市的主流和舒適生活，他就是有個強大的夢想、堅強的意志。所以他就聽不下別人的，就像我也聽不下別人的。

我來種田的時候就把書都丟了，想說這輩子不要再看書了。結果那時候就趕快把寫博士論文時有關開放社群的書，討論螞蟻、蜜蜂的行為，重新理解當一群有各自夢想的人、各自行動，也不是由上而下的指揮系統時，到底大家要如何形成集體力量？當螞蟻靠費洛蒙來走出一條路，慢慢氣味越來越濃而聚集更多螞蟻時，就產生集體行為。網路時代有太多這種案例，這種力量瞬間就爆炸，舊的系統就

不見了，很可怕。對我來說，合作社、協會，都是工業時代的一種組織型態。但到了網路時代，要有爆炸力且能夠驅動社會往前走的力量，是來自「開放社群」。像 Android 也是一個開放系統，大家都可以很容易進來參與，門檻很低。

如果我們倆佰甲當時決定是個封閉系統，就會變成再進行思想檢查，覺得那些不行、那些要共識，可能就做不下去了。後來發現什麼都不需要共識。後來我們到了割稻子前一天，有五位就退出倆佰甲。其實我到一半的時候，也有感覺他們應該想要離開了。因為這兩群人腦袋裡想的事情非常不一樣，一群人是有很多想要去推動社會改變的想法，另一群人就單純想開書店、種田、過著小確幸的日子。而比較具有社會意識形態的這群人離開了。

隔天下午，我們這群人就來把這個地方租下來，這個過去十年都沒有人使用的地方。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說，這群人是大家要保持距離、互相尊重，也不能用自己的標準去檢驗別人，不能說別人不對，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你沒有他的脈絡，所以要互相尊重。臉書上也是如此，各自講各自的，最多就是超連結相互分享轉 PO 加註，這個平台就是去支持各種可能性，可能還要處理一些糾紛問題。保持一個原則，不管你想什麼，不重要，只要願意把那塊田進行友善耕作，其他事情是你自己的事。這個就是剛剛青松講的「海選」。

友善耕作所田裡面草很長的事，地主會去跟青松告狀，青松打六折跟我說，我再打六折跟夥伴說，這樣他也還受得了。所以這要是一個很容易進入的支持系統，不要一開始就檢查認同，這樣不可能也不能這麼做。只要他願意進來，你就讓它進來。更何況，農村本來就是一個社會，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人，也需要這些各式各樣的人。你現在來到這個群聚，都很容易在各種社會議題上找到同志，但也很容易遇到對立面。任何議題都有不同的意見、對立的兩邊，這才是一個健全而多元的社會。這是在國家的政策系統中不會去談的事情。

像我們到今年，每年還是有十位新農夫進場，來了就是田地，租屋的問題我們還有機會協助一下，剩下的如何生存都是你自己的事，因為這是你自己愛的，「愛到卡慘死」。所以我們是不管夥伴死活的，開放系統就是這樣子。就像臉書，你什麼時候要退出臉書，這是你家的事啊。對我來說，你只要有一天，甚至只要有一個小時在顧這塊田、有在友善耕作，這樣就有貢獻了，我不會要求你貢獻一輩子。你來貢獻一天，我就肯定你。最好就是稻子插秧後要四個月，你說你只能顧到三個月又 29 天，然後就累了、不愛了，稻子我就來幫你收割。

如何可能讓這種事發生？就是要開放到不能有什麼太明確的規則，就是「海選」。

讓每個人很清楚地感受到，到這裡實現夢想，不會有很多人阻擋他，但也不見得會有人賞識，但是他就這可以在這裡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管是農田的事，還是想脫離原來的都市專業來發展新的專業，都可以。因為這邊都是這類的人，所以也會互相欣賞。因為都是喜歡自己搞原創的，想要走一條新的路的人，所以這裡就會聚集出這樣一群人，彼此會互相欣賞，也會觀察說如何從無到有。每個人的歷程都很類似，雖然內容可能不一樣，也很容易在平常找到夥伴交流、分享想法。就像臉書一樣，看到別人 po 的東西，按個讚、互相鼓勵。所以，這就有可能讓人開始做氣象站、農村廣播，各式各樣的東西，不只種田。這是這幾年我們在深溝村倆佰甲的經驗。關鍵就是要「開放系統」才有機會在農村裡面長出一個新的農村群聚。

我們這邊有兩個深溝村，一個友善耕作的深溝村，還有一個慣行的深溝村，這兩個農村慢慢地接軌，這是需要時間。開放系統就是在時間中讓事情很「有機地」發生，所以才有可能百花齊放，所以開放的平台系統很重要。

土拉客實驗農家園 蔡晏霖

因為有了穀東俱樂部、倆佰甲，我們的成員就是順著這個脈絡來到宜蘭。因為這樣，我們也在想像說我們可以為這個系統做些什麼。今天的分享包括了我參與土拉客六年來的反思，在這當中我看到什麼樣的困境是這個系統還有增加、擴張元件的空間，讓這個系統可以運作得更好。這個困境本身，不是這個系統的問題。而我們想要寫出來的 APP，想要解決的困境並不是穀東俱樂部或倆佰甲讓我們有覺得不夠的地方，而是這個系統在跟宜蘭既有農村在接合過程中，我們覺得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擴充、去嘗試和努力的。

但這樣的經驗其實也不只是宜蘭的經驗，我們要把它放到整個台灣的農村去思考。我們認為，如果這件事情可以在宜蘭做得起來，也許接下來就是可以把這樣的想法再擴散到其他地方。我今天要談的主題，就是從當新農進鄉，來到宜蘭，但是我們再這邊所面對的困境為何？以及如何突圍？

我的思考雖是從宜蘭出發，但是放眼台灣。因此，一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些不只是宜蘭才出現的狀況。談到返鄉務農這件事，到底難不難？對這件事有涉獵的人，應該都看到一些可能性，但也看到一些還讓妳裹足不前之處。最近有幾本書都很棒，包括 2016 年的[小村物語](#)、2017 年的[與地共生](#)、[給雞唱歌](#)，2018 年的[回家種田](#)。剛好是三個女人，寫她們如何回到各自的鄉村，一個是台南下營、一個是

宜蘭內城，一個是高雄美濃。從三本書可以看到，她們回到的是很不一樣的農村，也讓我們可以意識到，農村的問題有其普同性，但也有農村各自的特定性。

從台灣整體來講，返鄉務農這件事在這幾年應該是正面成長。雖然沒有直接的數據，但是如果觀察近三次的全國農業普查，94年、99年、104年，可以看到全台灣農牧戶整體是在下降的，但如果用年收入中以農產品為主要銷售收入是否超過兩萬元的家戶數量來觀察，會看到收入兩萬以上的家戶數有在成長。但是在兩萬元以下的家戶，亦即這些農戶是沒有從事實際的農產銷售，這些農戶是下降最多的。而銷售收如在兩萬元以上的家戶數是增加的。換言之，在整體農戶數下降的趨勢中，真正減少的是沒有在生產與銷售的農戶，但積極生產的農戶是在上升的。兩相抵消的結果，是讓整體農戶數的減少變成比較和緩一點。也就是說，雖然無法抵消整體老化的現象，但是積極務農進行生產的年輕農戶數是有增多的。

宜蘭這個趨勢是比全台灣的狀況來得和緩，宜蘭銷售在兩萬元以上的家戶數是高的，而銷售在兩萬元以下的農戶數減少量也很多，所以整體來說，雖然以數量上來看農戶數是下降的，但是這個數據背後所呈現的是一個比較樂觀的訊息是，相較於整體台灣來看，宜蘭青年農牧戶的成長是在增加的。

回到一開始所提問的「返鄉務農難不難？」已經有數字和實際行動案例證明，應該沒有那麼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要返什麼鄉？要如何返鄉？很多人都已經做到這件事，但當我們自己實際要去返鄉，就會遇到實際的問題：要如何回去？這會是大家關心的重點，這個趨勢要如何落實？

從比較分析性的角度來看，農業需要生產要素+勞動力+消費者，也就是要先有生產的條件、人力的投入，然後還要賣得出去。如果這三個要素缺一，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問題。缺消費者就是農產滯銷、缺勞動力就是農田棄耕，如果缺生產要素可是有勞動力，產生的就是流浪的農夫，農民沒有田可以種。

前面所提到的三本書代表台南、宜蘭、美濃的農村，面對的是不同的狀況。台南下營呈現的就是老化遲暮的農村，有田缺人種；美濃的農村是有田也有人，年輕人要進去比較困難，除非家裡有田。

宜蘭是農地相對細碎，農家經營規模受限，所以宜蘭離農的狀況也許是比西海岸南部更早。宜蘭的狀況是細碎化、老農把農地交給代耕業者，但也有一些田是太細碎、太多狀況而連代耕業者都不想種。這些田就是最早釋放出來讓友善小農可以進場的利基。宜蘭本來的狀況比較接近有田缺人，但因為鄰近台北，又釋放出比較畸零的田地，開始有一些新的人移入，產生新的可能性。

穀東俱樂部填起了消費者的缺位問題，但穀東俱樂部來到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契機是零碎地的釋出，透過美虹姊的在地網絡連結，使穀東俱樂部得以在宜蘭找到生產要素，填充進來年輕勞動力，再加上把原來的農田轉變為生態耕作，因而找到都市消費者。這讓生產要素、勞動力、消費者有一個新的連結可能性，產生宜蘭新農業的型態。

到了倆佰甲，就是把生產要素跟勞動力做了更好的補充。當手上拿到的田地多到個人的家庭農場可以負擔的時候，覺得可以把它釋放出來，因為有更多新農隨著雪隧通車而來到宜蘭想務農，但是在第一步就遇到問題，找不到生產要素。所以透過穀東俱樂部跟倆佰甲的合作，把生產要素跟新農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讓新的鏈結不只是在穀東俱樂部或是楊文全個人的關係中實現，更重要的是透過他們的開放性，把這種新的鏈結可以複製到更多人身上。這就是穀東俱樂部跟倆佰甲在這裡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某種意義上，穀東俱樂部跟倆佰甲的角色，可能是我們現在政府才要開始做的一種「民間歸鄉支援中心」的角色，提供返鄉務農初始的在地接合，包括土地、代耕系統、耕作技術等支持，以及相關的彈性外援。因為穀東俱樂部與倆佰甲所提供的不只是看得到的硬體，甚至還包括，當外面的媒體想要了解宜蘭發生的事情，其實有非常多的曝光、銷售、演講的機會，很多是透過穀東俱樂部和倆佰甲的軸心，把外面的資源分散到在宜蘭深溝進行友善耕作的新農群組上。這是在宜蘭實驗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模式，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務農模式。

所以，我們會看到田文社做了水稻家鄉的地圖，以及後來我們把它翻譯成英文版想要出版讓更多國際友人也看得到。所以，可以看到在深溝這邊，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務農單位結合在一起，以他們個人的專長、外地的網絡、個人興趣與個性，發展出各種姿態的小農。但基本上援引的都是前面所提到的新形態的務農鏈結，才能夠進場來到這裡。

相較台南和美濃，宜蘭的零碎化土地或不好的田，對於大規模農耕的角度來說是宜蘭不足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宜蘭更快就面臨農村老化和離農問題，但因為有新的鏈結可能性，所以就把這邊零碎化和有汙染可能性的農地，變成最適合友善生態的操作方法。因為友善耕作需要的是密集的人力投入，剛好代耕業者不要做，機器也很難做，我們就透過人力合作來完成。

之前做的都是比較偏向慣行的，但現在既然人力多，而且對生態有想法的，就把這些有湧泉的農地，利用它豐沛的水，讓它為在地帶來更豐富的農田水稻生態。

我們甚至想出對付福壽螺比較好的用手檢的方式，而不要用農藥去全面撲殺。種種這種生態嘗試，其實是在農村的裂縫之中，找到在的生物和友善小農的生存空間。從這些裂縫之中長出來的友善耕作，在食安風暴的時代獲得都市消費者的支持。所以，我們創造了一個新形態的農業是「化邊緣為利基」。

以這樣的友善耕作為基礎，我們在這裡還結合了每個個人之前不一樣的專業，讓原來可能對慣行農業來說就是半農半 X、兼業農、不專業等等不 OK 的部分，卻能在這裡可以把它轉化成強調農業功能多元化，不只是農業而是可以更多的生活型態結合，補足都市文明不足的地方。所以，在這裡看到的是「農」價值的翻轉。原本從農業生產來說，對宜蘭是相對不適合，但當農業本身也產生體質上的轉變，強調多元、跟城市連結、生產之外的生活與生態價值時，突然間，宜蘭的特殊新農型態，半農半 X、小規模的友善生態耕作，都變成新形態農業的利基。這不只是在這邊有很多人的努力，也是台灣集體大環境在翻轉，使宜蘭這邊發生的事情，可以跟都市、政策發生的事情接上軌道。「危機就變成轉機」。

但轉機也帶來新的危機。也正因為宜蘭縣在變成新農聚集，看起來是非常不一樣的非典型農村，加上跟台北的地利之便，來到這裡的人就不只是想來務農或守護土地，同樣也來了其他的人，想要享受宜蘭的好山好水好生態。如果我的地旁邊就有一個小農把田照顧得很好，而且還沒有噴農藥，提供生態多樣性的樂趣。宜蘭成為生態新農的新故鄉之後，也看到更多人也來到這裡，農村的土地、農舍炒作問題，同樣也是全台灣最嚴重的。宜蘭現在的狀況變成，人來了，但我們留不住田。我們的農田正以比農民移入更快的速度流失。之前在全盛時期，一天就有兩間農舍的建照發出。所以，宜蘭雖然有新的農業型態，但更現實的問題是，在與在地的農村接軌上，發現很大的問題：老農想賣地，但新農需要地。

所以，在宜蘭返鄉其實不難，有了穀東俱樂部和倆佰甲這種新的農村務農支援中心的存在，但難的是怎麼留下來。怎麼把在這一、兩年照顧好的田，不要讓它在第三年就被賣掉，或是隔壁就蓋起農舍。

土拉客在這邊所思考的是，我們還可以做怎樣更多的思考和行動來面對這件事。從農業組成來看，我們有消費者、勞動力，但是我們對生產要素的掌握是不夠穩固的，因為現在是以租田的方式。當宜蘭的土地具有非常高的都市售價誘因時，相較於大規模的房地炒作、資本入侵，我們的「抓地力」是不足的。

這反映宜蘭或台灣整體的經營型態，有一個很大的值得擔心的問題：農業的規模是相對較小的，通常也只有透過租地來達到規模經濟。而這種小規模的農業，通

常是透過家庭農場的方式在經營，要好好經營農業，除了要有這前面所提的三個要素，更重要的是這三者要如何結合起來。當台灣的農業是跟家庭綁在一起時，就會產生問題。像是當小孩不想務農時，家庭的人力就無法撐起家庭農場的勞動力需求。或是當小孩要回來務農時，家庭又極力把他推出去。所以，在過去普遍輕視農鄉、強調都市受薪階級工作時，曾經撐起台灣農業黃金時期的家庭農場，出現了內部矛盾，農業家庭已經出現許多沒有意願和能力支撐農業的狀況。

在這裡可以看到，台灣的家庭農場因為自己本身的考量，為了讓小孩在高居不下的都會房價中找到立足空間，或是要給他創業基金，基於這種可以理解的家庭想要延續下一代生存優勢的理由，已經把家庭延續的考量放在農業之前。在這個狀況下，家庭與農場產生矛盾，很多家庭農場面臨崩解的轉折點。有的家庭還在，但是已經不是透過家庭勞動力在支撐農場的營運，所以就會反映成為賣的離農的現象。

宜蘭不僅是在新農入場這方面提供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方向，宜蘭案例同時也顯示出，是家庭農場的崩壞所產生的後果最尖銳的地方，因為外在所提供的賣地誘因是最高的。所以，宜蘭在此所產生的是一種雙重性，新的可能性在此最容易發生，但能否繼續延續下去而不只是曇花一現，關鍵仍在於結構性的原因：我們到底能否在家庭農場崩壞之下，在宜蘭的老農為了下一代的再生產和延續而有高度的賣地誘因之下，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方法，新的結合土地和勞動力的方式？如果能找到，我們才比較有機會讓宜蘭的新農業型態可以延續下去，甚至擴散到全台灣。但如果找不到，深溝有很多已經進場的新農，下一步其實非常晦澀，不知道現在投入這些時間、體力、夢想，到底能否在宜蘭安老？還能在此務農多久？在這裡還有沒有希望？這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新農還要在宜蘭的土地上流浪多久？宜蘭的新農願景面對著那些高度的不確定性？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去想影響農業運作的要素之間要如何重新的結合，土地與勞動力之間，除了傳統的家庭農場之外，有沒有新的解方？

土拉客就是在這樣的想像之下，在 2012 年成立，2014 年順著穀東俱樂部和倆佰甲的協助搬到這裡，也在後來這三年發布穀東報告書。我們發現，土拉客確實為我們帶來一些好處。土拉客一開始是四位女同志所組成，我們覺得如果台灣就是一般的家庭農業，女人要不然就是出身農家並找到另一半願意一起務農，而且父母願意把田產和房子留給妳，一個女人才有辦法留在農村。要不然就是嫁入農家，找到有田且父母願意支持他務農的伴侶嫁給他。但是，身為女同志，其實這不會是我們想走的一條路。所以我們是基於非常個人的理由，來讓女同志多元成

家，在成家同時也一起務農，不走傳統家庭農場之路而是靠自己試試看，能否靠四個女同志一起組織另類的、多元的農家，在農村找到生存之道。

所以，一開始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展開四個人的合作。後來發現這樣的想法不壞，因為傳統農場家庭要增加勞動力，就是靠嫁娶或生育下一代，但是養育小孩要先花一大筆錢，等他也許 15 歲之後願意在田裡面協助，才能讓田間勞動力成長。從土拉客的角度來看，如果不靠上述的型態，我們的勞動力是可以靈活的成長，要加入要退出都很自由。相較於傳統農家來說，我們有個開放的組織邊界。成長的不只是勞動力，因為每個成員都帶著各自的資源、喜好而來，原來的土拉客四個人之中，有善於交際、寫文章、錢多、體力多、具有實驗精神，或擅於守成算帳做紀錄，等於是把大家的興趣和專長，透過實驗農家園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所以不只勞動力成長，也讓各式各樣的專長得以成長。當從四個人又變成六個人之後，聚集起來的專長和特質，像不怕蟑螂、會用媒體、冷知識王等等，讓土拉客的能力又再進一步獲得擴張的機會。

這種模式突破傳統家庭農場的侷限和界線，使我們的成長具有多元的空間。此外，有多人的投入，也會讓我們可以生產的品項變多。一開始，我們是從水稻進場，去年開始有六個人了，除了米食加工和菜園之外，也加入了果園。我們因為有了多人的勞動力和專長投入，今年是第一次可以把我們一個農場的生產品項，擴充繪製成整年度的生產銷售圖，進入了多元生產行銷的模式。所以我們會把原有的 CSA 中把一樣產品賣給更多客戶，轉變為把更多的產品賣給同一個客戶。一個人可能之前買米，就是一年只做一次生意，因為再怎樣也吃不了這麼多米。但當我們現在可以生產這麼多東西時，就不斷跟顧客產生食與農之間的互動。我們相信這種互動會更為綿密，彼此之間的支持也會更堅強。

另一件在土拉客教我們的事情，是透過家庭資源的共享，可以更快整合各個成員的資源。除了資源整合外，土拉客在前四年還做了一件事，就是大家能不能住在一起。所以，我們同居共食而省了房租和原本由個別所承擔的生活支出。但是，確實要把不同人聚集在一起，也要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大部分時候是很難讓大家同步前進，很難有一個人發號施令，其他人就會心悅誠服。我們是一開始不開會的，但到現在是每周都要開會，因為我們覺得，如果要讓大家緊密合作，是必須要細緻地進行溝通，也很努力地在吵架。在這種異中求同的過程中，也是在培養我們自己彼此之間的組織韌力。但我們也有失敗的經驗，也有夥伴說這種模式不是她所想要的，而是想自己一個人安靜務農就好，所以有伙伴就選擇離開。而留下來的，就漸漸對這種務農方式有了我們自己的共同理想和覺悟。我們明白，

大家要在一起就要有吵架的準備，吵完架之後也要有心理準備，不能把在吵架過程中所說的話看得太重，或是要自己拿捏在吵架之中有那些能講、那些不能講。

在土拉客的運作過程中，有很多吵吵鬧鬧，也不斷地面臨錯誤，每年都在修正我們的經營模式，所以叫「實驗農家園」，每年都在做實驗。從 2014 年搬到深溝正是算起，成員數一直在改變，到 2017 年才有比較正式的組成，而生產方式越來越多元，但個人與集體之間也在嘗試調整。一開始，土拉客是希望以一種大水庫的方式，把生產的收入全部集中，再盡量分配給有需要的人，所以當時除了同居共食、共同支出之外，還幫每個人保了勞健保。但後來發現共同支出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坑，會在每年的生產循環中出現很多資金周轉不靈的狀況，就像一個水龍頭開很大，所以會一直出去，周轉不靈就產生內部爭執。而且，錢進來之後就會產生花錢方式有不同的意見。所以，對於什麼是土拉客共同要做或不做、能做不能做、該怎麼做等的共同問題，是不斷在實驗的。

以前是由土拉客支應所有的生產支出，而獲益也一律先進到土拉客，支付共同支出之後，剩下利潤再分配給成員。最新的實驗是如果分開來，分開住在不同的地方，對於大家給予部分的食住補貼，生產成本由個別支應，把所有農產的收入改為先回填生產者的成本，之後有盈餘才視比例回捐到土拉客。有意思的地方是，某種意思上，我們也開始朝向倆佰甲的模式在接近，倆佰甲是很多不同的農家和個人，在生產上做緊密結合。土拉客之前在生產、銷售，和居住上都做緊密結合，現在是把生活結合拆開來，維持生產銷售的結合。這會產生什麼後果，我們也在實驗中。這就是土拉客的演化史，從女同志的多元成家到女人從農的孵育站，我們覺得就是讓大家先進來、先開始，到現在變成是多個農人產銷合作平台。而跟倆佰甲不同的是，我們認為大家的合作要在一個更緊密的層次，所以包含銷售。另外就是生產合作也不只是單一作物的合作，還是希望能夠不只一次性地對消費者提供產品，而是能以多元產品來與消費者建立比較綿密細長的關係，這樣我們六個人之間也才不會產生競爭關係。但如果土拉客成員生產的品項是不一樣的，在聯合行銷上就不會有矛盾，相對地還會很樂意幫夥伴推銷，透過運費整合品項共銷的方式，讓利益可以高度結合。

這種超越傳統家庭農場的模式也不是我們獨創。在這住月久就發現這件事也沒有那麼特別。宜蘭過去的結手制，二結、三結、五結這些地方，就是一群單身男人來這開墾進行合作生產，就是超越家庭農場。另外，土拉客之前租到了一塊田，先前的耕作者就是深溝在地一位很著名的女農，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家族成員都在覬覦這塊田地，家庭農場的體系內有糾紛，是因為隔壁鄰居常常去支援她、

幫助她耕作和生活，才有辦法把這塊田留在家中，現在才轉租給我們。對土拉客來說，這段故事是很有意義的，之前的女農就是以超越家庭農場的方式來保存這塊讓她得以持續耕作生產的田。

我們的努力也被宜蘭在地老農看到，去年就有一位有名的水果老農來找我們，認為他一身水果栽植技術無人可傳，也很難透過國家力量寫下來做傳承，所以就開放農場，把技術全部傳承給土拉客，唯一條件就是要完整學四年。這個過程讓我們知道，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其他老農看得懂的事，知道我們想做超越傳統家庭農場的一種結合勞動力、生產、技術的方式。這就像加掛一個新的 APP 一樣，讓老農自願外掛加入了土拉客的系統，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有機水果可以生產。

在這邊進行超越家庭農場的不只我們。農機共享合作社是由很多宜蘭在地友善耕作小農來合作，以入股方式買了插秧機和耕作設備。這種以超越家庭農場讓宜蘭新農可以有更強的抓地力，是有很多人都在努力。

結論是，只要我們願意去解放對家庭農場的想像，就有可能解放對於台灣農業的想像，也有可能開創台灣農業不同的未來。

在南方澳的海味生活 鄭雅孺

我比較不是典型的歸鄉或移居者，在地人對我目前的身份定位比較像是「旅居」。身份是我這一年多來，讓我自己很困惑的地方，也是在地人不知道該怎麼理解我的一種情況。今天比較像是在分享我的焦慮。

南方澳是在蘇澳的漁村，裡面有三個漁港，從位於中間的第一漁港，1912 年建港，因應漁船的需求，後來又興闢了第二漁港、第三漁港。在 2017 年住進南方澳之前，我是不知道台灣有個叫南方澳的地方，也很少去過漁村，頂多去基隆逛一下，但對漁村是非常陌生。而因為家中吃素，所以平常在家也很少會吃到海鮮。因此，對於漁村、漁業、海鮮，我是全然陌生。

我常跟我的朋友在講，我覺得我是個失根的年輕人。在我認識南方澳以後才赫然發現，原來在我的求學和成長的過程中，都沒有可以跟海或漁村接近的機會。當我住進南方澳之後，才開始發現原來南方澳創造了那麼多的第一。從日治時期有規劃性地將這裡變成漁港，也安排日本人移民來南方澳。也因為漁港興建，和優良的天然環境，所以漁場、魚群非常豐富。很多島內的漁人就會各自開著船來到南方澳，有從澎湖、屏東東港、小琉球、基隆，南方澳就是一個人群非常多元的

地方，不管當時或現在，也帶來很多不同的漁法。也因為是非常多漁人追逐的漁場和魚群，所以當時有非常多人住進南方澳，在五、六零年代時，曾經人口密度創下全世界第一。晚近幾年，也是第一個以外籍漁工為主創了工會，還有台灣現在唯一一個有珊瑚漁船的地方也是在南方澳。

我對漁村、漁業、海鮮、海洋這麼陌生，為什麼選擇在南方澳呢？在 2017 年時，離開做了四年的平面雜誌的文字記者工作，之後就在台灣內從不同的朋友社群中參與朋友在地方的農務工作或是自然建築等。遊走台灣各地時，剛好聽到一個由南方澳在地文史工作者發起的「海鯖回家」，關心南方澳主要漁產的一個行動。當時的主要訴求是，因為全台灣有八至九成的魚種是鯖魚，產地是在南方澳，但這個魚種卻因為在近幾年進步的漁船作業方法，以及整體海洋生態變化、海水暖化、黑潮位移等情況，整體環境造成鯖魚越捕越少、越捕越小。在地人發現南方澳的重要魚種面臨險峻狀況，想要讓更多人知道。當時我因為朋友的分享而輾轉知道這個活動，從 2017 年的一月到六月，將近半年多以上的時間去認識這個行動的內容。

他們的行動內容，因為成員比較多是獨木舟背景跟自然環境生態分享相關的人，所以當初號召的行動之一，就是從南方澳划獨木舟到石垣島，走一條鯖魚洄游的路線。我就在這半年之中支持他們的行動，台北和南方澳點跟點之間往返，了解這個完成行動所需的行政、資金、人力等細節和背景。行動最後成功了，但過程中我也開始在想我好像還不夠認識南方澳，因為在越來越接近出發的時候，我一周往返台北和南方澳兩次，都只是在南方澳的 A 或 B 點，在這六個月之中都還沒有機會認識南方澳是什麼樣的漁村，也只是聽行動發起人講述鯖魚的狀況。所以，活動參與到後期，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聽二手資訊的分享，也都只是「聽說」，聽說捕不到魚、禁漁期禁錯時間、聽說鯖魚洄游的季節，都只是別人的轉述。

當行動告一段落，我覺得我好像可以住進南方澳。這是一個很直覺式，可能也是過去做文字撰述採訪的背景，覺得南方澳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在那六個月頻繁地聽人轉述南方澳的興盛、漁法，生龍活虎的生活想像。但都只是聽人轉述。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住進來，了解漁村發生什麼事，以及他們口中的漁人如何面對大環境的改變。

南方澳是一個只有兩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但卻是一個很多對於採訪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很迷人、很多事情可以採訪的地方，有關海洋休閒、漁業、海鮮、漁工等議題，都在這兩平方公里之中，不用騎機車或開車，只要走路就可以在這範圍之

中去探索這個漁村。所以，2017年9月，我就住進南方澳，開啟「海味生活計畫」。那時剛好我有一個朋友也輾轉分享文化部的「青年文化村落」計畫，獎助年輕人進入農漁村或社區，只要提案經過審核、面試，就可以展開行動，會獲得一筆補助獎金支持。當時也提了這個計畫獲得通過，所以第一年在起心動念之後提出這個計畫，有另外兩位夥伴一起，一位是遊走在很多不同協會與組織之中的謝昇龍，幫我們這個計畫串連了很多南方澳以外都在從事社區工作的朋友。另一位是在海鯖回家活動中朝夕相處的夥伴蔡宛伶，當我提出想住進漁村展開這個計畫時，她就很支持我，也有想實現的東西，所以就一起加入。這一年就是以我們三位在南方澳展開計畫，主要是我住在南方澳裡面。

在這年中，我們做了這三項：田調紀錄、食魚教育、小旅行。雖然很單純的只有三項，但也把我們搞得人仰馬翻。因為進入社區這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也都不是我們一年前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因為進入社區的人際相處，在不同屬性的社團中互動，跟我們想認識的漁人、從業人員的互動，也都非常陌生，很多時候都是要在時間中慢慢累積。我們自己也在這過程中閱讀資料與論文和第一手的田調訪談。所以我們在第一年這三項做得不多，但也耗盡我們第一年的心力，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海味生活計畫，但做的進度比我們一年前開展的計畫設想來得有限。

住進漁村後，我自己開始設想說，除了在地所認識的幾位文史工作者外，還能夠在哪展開我的人際網絡，就想說我自己可以寫稿、自己有興趣做採訪，於是就加入一份在地的刊物叫「南風澳」。他們在2000年時創刊，中途運作三年不到就停刊，剛好我住進去那年又復刊，所以就幸運有這樣的平台可以讓我快速了解地方脈絡，整個成員都是南方澳中最活躍的、資訊消息最靈通的管道。我就藉此拓散我的認識。第一年是什麼都不知道、都新鮮，就什麼都去參與，還包括去參與漁會跟宜蘭縣政府所舉辦的縣政會議，以此了解漁業議題，知道漁人所關心的法規和最在意的領域、話題。這一年參與的場次並不多，大概五次不到。但每次跟這些漁人參與會議，都會是個很大的震撼，每場都是髒話連篇、非常生猛直接，不留情面也沒有要給政府官員台階下，一股腦就清出自己的委屈和作業上的困難。所以其實跟我們一般求學或工作階段，大家去開會時是隱藏自己的不爽和情緒的那種狀況非常不一樣。

也因為這樣，讓我在漁村中與漁人互動時，對自己進行重新的再教育。跟漁人問問題都是直接的互動，但也因為這樣，也在這些互動過程中也有受到一些很直接的調侃，認為我什麼都不懂為什麼要來漁村，是不是只是做研究的研究生，問問問題就要走了；我自己討海這麼多年的經驗為什麼要跟你講，問問題也不是來討

海，那問這麼多要幹嘛，諸如此類。也參加了漁村的民俗活動，包括做大漁旗。現在比較少有新船製造。早年新漁船要下水的時候，漁村都會製作大漁旗去餽贈船家，祝船家新船出海能豐收。這一年剛好有一、兩次的機會巧遇新船下水，所以就參與他們大漁旗製作和新船下水當天的儀式，去了解漁村曾有的風光、在地祭典和鮪魚祭。

漁村的習俗是，只要有重大的節慶，都一定會幾百艘漁船從漁港出海，舉辦漁船繞境，這也是我在這一年第一次參與。雖然大家作業的漁法不同、來處也不同，移民過來也是以自己的地緣網絡為基礎，但是有重大節慶，其實都團結在一起、盛大出航。大部分都是在媽祖誕辰慶祝的時候，或是建廟五十年、百年大醮等等。像今年的南方澳非常熱鬧，漁村內的廟宇輪番五十周年、百年，又有漁民節、鮪魚祭典等，每次都有海上繞境的風光場面。

也因為住進漁村，所以也會看到日常中鄰居處理魚的畫面。我鄰居的兩個兒子都是討海人，都是從事捕撈鮪魚的三角捕魚船，不定期地會有一些魚獲，不一定是主要魚種，但只要有魚獲就會左右鄰居互相分享。常會看到他們在門口處理魚。漁村家戶門口都會有一座洗手台，不大，旁邊有兩到三個大型冷凍櫃。如果看到這樣的家戶建築，就會知道家中是有人在從事討海。門口之所以有洗手台和很方便的海水設備，就是方便他們在門口處理新鮮魚獲。有時候在路上也會很剛好，轉個彎就看到一些有趣的狀況。

對在地魚人或不是從事討海相關的民眾來說，海鮮是互贈的、是非常便宜的，不需要花錢去買。我曾經就是在魚市場買了一條八十元的鮪魚，就被她們笑說「買貴了」、「南方澳沒有人在花錢買鮪魚的」、「完全是外行的人不懂」。像有人會去跟他魚人朋友直接拿鬼頭刀，然後就直接夾在自行車後面的置物檯上夾住帶回家，或是夏天在路邊曬蝦子。

我後來在漁村中，大部分都是接觸到男性的作業員，不管是什麼漁法。當時我就很好奇，因為我是身為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場的漁村中，常常遇到找不到施力點去切入的困境。當時輾轉知道漁村中有家政班，大部分是船長夫人齊聚聯誼或互相切磋的團體，我們就從認識船長夫人開始切入，想認識漁村男性以外的其他社群，那些聲量比較低的女性在哪？後來約訪了五、六個比較活躍的船長夫人，從訪談過程中嘗試透過漁村料理當作媒介，搭配到我們計畫中所想進行的食魚教育和小旅行，可以更結合在地。在地食材、在地料理、在的活動，產生更具有體驗性的活動。在這些嘗試過程中，也認識了在漁村中比較少被看見的女性。

在進行採訪的過程中，前兩、三個月就是每天外食，把漁村中所有的小吃店店家，不管好不好吃都全先吃過一遍，先認識一下老闆，年輕的店就更一定要去認識。認識完之後就開始想說有那些場的適合約訪的空間。在幾次約訪的過程中，就會跟新面孔訪談時就會約在開放式的場合。有趣的是，除了漁人之外，我比較多是採訪跟我同年齡層的年輕人，就發現這些年輕人之間其實並不是很熟識，甚至有些是完全不認識。這也讓我訝異，漁村的生活型態原來是非常固定的，即便年輕人也都是向外去連結，或是交友圈很固定在求學階段所累積下來的。所以，當有年輕人返鄉，或是住在在地，或開始要嘗試認識新的動態時，其實是比我還要陌生的。因為我是短時間快速地去認識和找資源，所以我反而是了解的比他們還要多。所以就一些開放的場合中，我可能就變成是一個中間的介紹者，把我最近認識的受訪者介紹給那些青年返鄉創業的老闆，彼此串聯認識，了解彼此為何返鄉、返鄉做哪些事，也有一些事返鄉做跟漁村無關的工作。但無論如何，就是先讓彼此面對面、聊天串聯。我發現這是我在漁村住了一年，出乎意料所著墨較多的事情。雖然這個過程中好像創造很多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也是很曖昧的。

採訪漁人也是我一個很大的難處。住進南方澳的初衷是我好奇自己為何從來都不認識漁業、海洋、漁村，覺得我自己是個失根的人。當時我是想，如何認識這些我原本不認識的地區和對象，住進來是最快速的方式。但要如何理解這群全然陌生的人？後來我發現自己住進南方澳，有一個想要實現、或是透過個人力量想要去嘗試的行動是，想要嘗試了解我從來都不認識的對象，想要了解他們在這個工作場域如何進行工作、遇到什麼難題和挑戰，以及如何克服。但當我想要逼近這樣的目標時，這群漁人真的很難接近，包括他們講話很直接。有幾次好不容易有機會打進漁人聚會的場合，但可能就是很直接地被請出去，那是完全不留情面地認為我在會讓他們講話都很困難，我是女生會讓他們講髒話、開黃腔、抽菸喝酒都很不方便。我自己回去後也會很灰心，光是要理解就很困難。

其次，是我的身份很模糊，既不是研究生也不是有志從事漁業的討海人，未來也應該是從事跟漁業無關的角色，那我要如何讓漁村認同我的存在，讓這些我第一次見面的人可以理解我在幹嘛？這是在我這一年之中不斷遇到的難題。當然還是會有一些願意跟我互動、願意跟我分享討海經驗的人，但是非常非常少數，一隻手可以算得出來的人。

跟人出海也是另一件難事。在漁村即便看到停泊著漁船，那都不是漁人的戰場，他們的戰場是海上。我們曾經有問過討海人的船上作業空間，是否有想過要把漁船做得舒適一點，他就會回我說：「討海是要拚搏的，不是要爽的。」他們會覺

得我是出海去拚搏，不是去享受，而我跟他們講說船艙很克難、漁工沒有地方住，這些對他們來講不是切身相關，因為他們出海就是要工作。那些舒適、享受，都不是他們最優先考慮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船員證，也沒有找到願意讓我上船的船公司或漁人，就變成要理解他們口中的戰場，我只能透過想像跟口述、田野資料。真正有機會的是剛剛講到逢節慶有一些漁船集體出港的繞境活動，我勉強可以搭上去，就是搭在那種出海捕魚的漁船，而不是出海休閒釣魚的海釣船。就有機會跟著漁人出海，也可以藉著在那個環境下，去跟討海人對話。剛好也有遇到當地有那種漁船後來轉型為娛樂用的海釣船，由曾經有討海經驗的船長帶領大家出海釣魚，有跟過幾次出海釣魚、在船上吃飯。也是透過這個方式不斷拼湊所謂「討海」是什麼樣的場景，但那也只是他們生活的一個片段部分。

在田野調查之外，我們另一個部分是做食魚講座。我因為家人吃素所以很少吃海鮮，我們這一年做的行動很多都是自我教育，覺得我失去很多機會可以學這些東西，那我就自己去找資源、找老師，開始學習。透過這樣的學習，我們也把它變成講座和實際參訪的機會，帶跟我們一樣都對漁村漁業很無知的人去學習。我們就跟臺灣永續蠶漁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也是年輕人，經過幾次的對談和了解彼此想做的方向，就設定幾個很初階的主題，也是我自己想學的事情，把它變成講座分享給有意想認識「食魚」的民眾。上週我們也帶想了解水產加工的民眾，一起去參觀水產加工廠，去看漁獲捕撈上來後進到市場或加工廠時，所會經過的作業處理流程。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所以覺得如果可以辦一個實際參訪的行程，直接透過眼睛、感受、負責人的解說，可以更了解這個產業。這個加工廠負責人也是我在做田野訪談時輾轉認識的大哥，也曾經討海過。相較於我剛剛講說比較直接一點的漁人，他是很願意分享和傳授經驗的從業人員。所以從他身上彌補了很多我很難跟第一線工作者互動與學習的部分。

在漁港之旅部分，南方澳有三個港口，每個港口所停泊的漁船都不同，都有不同的作業生態。如何讓來南方澳的人不只是在街上吃吃喝喝，或只是在媽祖廟裡拜拜而已，如何透過專業人士帶大家去走漁港、去認識漁船、漁法、季節魚種等比較貼近產業面的知識、故事，我們就是透過漁港之旅帶給大家。漁工是我個人相當好奇也想了解的領域。我的鄰居，除了剛剛講到經常在處理魚獲的阿嬤，另外一個就是一位印尼漁工，他待的是每天比較常往返的漁船，幾乎每天都會遇到。因為他曾經待過屏東東港的漁船，待了三年，閩南語很溜，來到南方澳以後就變成是協助很多印尼漁工翻譯的主要對象，也是組織中對外連結溝通的角色。所以

我跟這名漁工的互動方式就是講閩南語。這個社群有千人以上，是我每天走在南方澳路上就會遇到的對象，每天出現在眼前，而我卻對他們不了解。所以我就經過幾次互動，跟他們之中可以透過語言溝通的對象進行田野訪談，採訪他們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幫忙漁工處理權益糾紛的組織，如何維持他們清真寺的環境和組織運作。經過幾次訪談後，發現跟他的互動還蠻不錯的，所以在他們允許的情況下，我們辦了一個真人圖書館的活動，邀請朋友一起來，讓他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印尼漁工如何組織、在南方澳的生活，也安排漁工視角的小旅行，請他帶我們去認識他們自己租賃的民宅整理成清真禮拜的地方，以及拜訪東南亞的商店、認識老闆，還有印尼店、小吃店，認識每一個隱身在巷子內但是對漁工的生活和精神寄託都還蠻重要的場域。

這個月初，文化部在華山舉辦的結合「雜學校」的年度成果展的平台，每一組有機會可以上分享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做了哪些活動、對地方有什麼貢獻。當時主持人就有提問，問我們覺得對地方所產生的地方貢獻跟影響？那時候我其實有點愣住，覺得好像沒有造成什麼貢獻或影響。但後來沉澱了一下，覺得我自己存在在漁村，某種程度就是一種貢獻。我都開玩笑說可以拉低整個漁村的平均年齡。但當我真正回想所造成的貢獻，可能是當我參與了地方誌的組織，地方誌內容非常豐富，但他們又常常覺得自己矮人一截，或是覺得自己的內容不夠好。但在十月初的分享時，介紹給來參觀的民眾朋友，意外受到好評，我們就把這個好評也帶回漁村。因為當時地方誌是採隨喜捐獻，所以經費運作也非常克難，那時我們也讓來參訪的人可以隨喜捐贈，支持地方誌的營運，也有數千元的回饋。

這讓我發現說，真正在做對地方有貢獻的事情、真正紮實地做這些事，是可以獲得支持並且有人看見的。有時候，像地方辦活動沒有辦法給講師費，或是講師來了卻沒有人來，對講師也很抱歉。他們會常常礙於這兩個原因而不敢辦活動。但我會覺得這兩個原因不是很難處理的事情，我就會跟夥伴商量看該如何去找資源、找資金、找人，透過這樣的行動去證明辦活動是可行，支持地方的人辦想辦的活動。透過辦活動來讓在地青年彼此認識，也讓沒有來過漁村的人可以藉由我們的分享認識南方澳。

困難與挑戰之處在於，就是身為女性在漁村之中，常常會遇到很多的調侃。像我鄰居的阿嬤常常會跟我說要幫我介紹對象，誰誰誰阿嬤從小看他長大然後要幫我介紹。就會覺得身為一個女性年輕人來到漁村很奇怪，而她的孫子都是一個個跑到都市，為什麼我要來？會質疑我要待多久、我的退場機制、我的停損點等等，會比我還要擔心我的未來，也會覺得女生到一定的年紀就要嫁了，就可以不用去

做這些事情。再來是身為外地人的角色，因為南方澳是個很自成一群的族群，甚至把自己跟蘇澳做劃分，「我們是南方澳人」的地域性很明顯。一個生面孔進到漁村之中，說想要認識漁村漁人這樣的行動，會讓他們覺得我是來「沾醬油的」，一下子就會走了，甚至要談合作、一起辦活動都會抱持觀望的態度。

我的切入點是從過去完全八竿子打不著的領域去進行，雖然是從陌生的領域切入，但因為陌生也讓我找得到老師或是業界的熟手帶路，這一點雖然是一種挑戰，但也相對好處理。再來是主動跟等待的拿捏，因為我現在是自己一個人住在那，但這一年也讓地方認識我，我也認識地方，所以也會發現潛在擴大合作的成員。不過也會常常思索我要主動到什麼樣的程度，才不會干預整個地方團體的成長方向。或是我要等待，可能等待潛在的成員覺得可以一起創造或做些什麼。這種主動與被動的拿捏，我自己已還再衡量。再來是工作不好找，是普遍在農漁村面臨的狀況，如果不是第一級的勞動者，在漁村之中要找到工作機會比較多是服務業或是自己創業。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偏向做文史採訪，或是把田調的收穫再去轉譯其他活動。這樣的方式創造力更強，但對我來說也需要一點時間去累積，而這個時間的過渡期，第一年我是透過我另外一份工作，我在一個推廣獨木舟跟海上休憩的工作去平衡我在這一年之中進行這個計畫的收入。所以如果不是剛剛所說的這幾個選項的人，真的要住進來漁村，然後想要一起做一些什麼行動，首先會面臨到的挑戰是收入的問題。

未來計畫的部分，上次在辦漁港導覽活動時，有請廖鴻基老師來做一些南方澳的漁港導讀的帶領者。這年跟廖鴻基老師學到很多，因為他曾經做過討海人，後來透過文學去推廣，讓大家親近與認識海洋議題。他常常往海上去，有任何行動，包含我們會覺得跟海洋很陌生，他就會告訴我們去親近海洋。跟漁人不認識，他會認為總會有願意跟我們分享的漁人，那就是去跟著他學習。他會覺得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的，不能偏廢的是往海上去。我自己覺得這也是我剛剛提到的「尋根」有關，不管是土地或海洋，都是自然的力量。我這一年也很頻繁地接觸海洋，搭帆船或是划獨木舟，甚至開始學游泳，真正往海上去時才發現我過去二、三十年錯過這麼多親近自然、讓自己紮根的機會。未來不管事什麼計畫，我都覺得我應該要再多認識大海跟往海上去。

回到我這一年所做的田調，雖然廣泛而淺薄，但第二年還是想要聚焦在漁人，以及是不是有接班人這些議題上。在我第一年的田調過程中，發現是有接班人的，這些接班人面臨什麼挑戰、如何克服，這也是我想要再聚焦地去紀錄和呈現的。再來是持續串聯和認識有志一同的朋友，因為我認為凝聚的力量是可以在漁村裡

頭越擴越大的。支持在地年輕人發揮自己的專長，因為在之前的接觸過程中，是可以發現在地的年輕人是具有他自己的屬性和想在漁村實現的東西，我們也嘗試在彼此激盪的過程中，即使是一次也好，也讓他們有越來越多可以發揮自己專長的機會。第二年也希望能有個空間，因為目前還是自己單純租賃一個房間自己住，接下來想要有一個對外交流呈現和累積的空間，讓行動可以越來越大。

最後補充說明，南方澳最近有一個對地方而言還蠻大的事情，就是民國 51 年成立的舊漁會，下面有個拍賣市場，其實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在原址有木造建築，後來陸續經過改造。目前已經算是危樓了，所以在上周這整棟已經被拆掉了，而漁會想要再蓋一個，未來可能會再蓋出一個新的魚市場。我自己就很好奇，這也是我在第二年想要去挖掘和探索的，想要去採訪漁販、漁人、地方居住者，魚市場旁邊的住戶們，到底對於即將建港百年的南方澳來說，需要什麼樣的漁會建築，這將是南方澳很重要的轉機，不過目前卻是沒有這樣的討論。但我想這可能是長期大家習以為常，對於地方建設、開發都缺乏參與所導致。但這可能是一個機會可以開始思索，一個地方不管是在地認同，或是外來的觀光客可以獲得他們所想要深入認識地方的機會，魚市場都會是一個很經典、很重要的場域。在地需要什麼魚市場，這是我未來想要再進一步挖掘的。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在進入提問與討論之前，我先小結一下。因為要討論地方創生、農村創生的議題，所以我們這一、兩個月進行地方拜訪，有在地很年輕的團隊，或是在地深根的經營者，他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怎麼思考過去行動的經驗。這些訪談的收獲慢慢可以凝聚出一些共同點，像是返鄉的動機都是受到某種起心動念的影響，也許不需要到「愛到卡慘死」的地步，但隱隱約約都會有「朝思暮想」的狀況，就是一直掛念著「如果我回去也許就可以怎樣、做什麼事」的想法，或是會考慮到家中的長輩、家中的田地等等，所以就會想要返鄉。

但是，這種起心動念的過程，到後來都會浮現兩種需要克服的問題：一是回去之後如何跟原本就在地方的社群生活網絡接合，能夠建立一個最起碼彼此不衝突、可以嘗試的機會，如何找到那種彼此可以相互接納的機制。有很多待不下去的，就是在這樣的機制介面上無法處理。另外一種情形是，能夠遇到像青松或倆佰甲這樣的連結者，願意分享經驗、協助融入地方、提供解決方法。但也會有像雅孀這種是外地人移居過去，人生地不熟，缺乏財務和社會資本，但又對返鄉想從事

的事情很有興趣，那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這個世代的返鄉者、移居者，會很重視一件事，就是「關係資產」。就是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地方接上關係、彼此互補，或是幫地方銜接外界。要達到這件事，把活動帶進來、把可能性帶進來，就不會是一個人自己做。所以，訪問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遇過那種撐了一、兩年都還是自己一個人做的。大概都半年以內，最遲一年以內，就會開始找夥伴了。甚至有一開始就不是從在地找夥伴，而是把原本自己在外面的社交網絡帶進來一起做。這些夥伴，有時候是扮演著能力的互補以及心理的陪伴。這樣的系統要慢慢起來之後，就會遇到晏林剛剛分享的，當我們要一起過生活、一起工作時，有哪些事情該怎麼運作、彼此能否接受這個方式等，就需要嘗試與實驗，或是去拿捏彼此專長的差異如何反應為平等的貢獻、對話角色，和收獲分配。這些技術層次的問題，往往也影響後來大家是否還能在一起，同樣需要多一點經驗分享。

這樣的關係網絡進去之後，也逐漸可以看到有新的可能性被開放出來。因為這些人是帶著與地方原本做事模式不同的新眼光和新網絡進去，有另外一套網絡進來之後，原本不被視為是資產的，也可以變成是資產了；原本只是等著被拆的老房子，但因為有了不同的眼光和能力，就可能知道如何重新整修和營運，這些可能性被開放出來之後，因此而生的磁吸效果，可以帶來更多的人進來。所以，網絡上比較能搜尋到的亮眼案例，大概都已經進展到有一群多才多藝的夥伴，在地方經營出一個據點，形成聚集效應。

接下來就會遇到青松大哥講的第四階段，一個是農地如果無法在農村生活中持續保有其運作的凝聚力和特殊角色，讓大家在務農為基礎上開展共同生活時，就會失去回去的著力點。沒有這個著力點，就會讓大家失去對共同生活的著眼點和發言權。後面反映的是，到底我們是如何想像「農村」所代表的意思？我們到底所談的「農村」指涉的是什麼？這些大概就是目前為止進行各地訪談所獲得的經驗。

提問與討論

Q：像土拉客這樣是一起共耕？還是如何分配彼此的生產工作？

蔡晏霖：我們生產的田區是分開的，這樣會比較清楚，比較能夠明確釐清各自的生產責任和獲益，各自有各自的田區，在田區的投入就會回饋到自己的田間產出。

但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共同的事務，我們盡量做到把它變成不同的喜好和能力都夠一起合作分配承擔的。確實有一些夥伴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像記帳我就沒辦法，但我就比較能夠負責對外的文字說明，需要文字編輯和思考組織的工作，這個是她們不想做，所以就會交給我。理想的狀況是每個人能夠找到分工的方式，是做到自己喜歡做而別人討厭做的。

黃仁志：如果大家暫時沒有提問，我想再請青松大哥分享一下關於「東亞曼島生活圈」的想法。

賴青松：「東亞曼島生活圈」是上次仁志來的時候我跟他講到的一件事情。因為台灣作為一個海島，是有一些不同的發揮空間可以進行。但是，從 2004 年我來到深溝村進行半農半 X 的實驗之後，一直到今天我都只有一個目標，我的理由非常個人也私密，我只是想要回到土地生活、遠離都市。我覺得都市的生活不適合我，而且如果可能，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在這裡安穩地長大，有一個叫做故鄉的地方。不要像我，我父親做生意到處去，一個國中轉三個地方，我弟小學轉四間。那是在經濟成長的波濤當中的成長經驗。我一直對在經濟浪頭上征戰生活的想法有點排拒，可能是這個念頭帶我回到鄉村。

在我十一歲那年，當我的父親母親都不在家的時候，是回到我阿公的鄉下去，是手頭上根本沒有現金，只知道養牛種田跟種果樹的老農夫，讓這個瀕臨破碎的家庭有地方可以安養生息。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契機，是那條線索一直牽引我回到土地上。

大家會坐在這邊，大概都有一些線索，如果沒有說一些話，很可惜。其實不是提問，因為所有的問題都在自己的腦海當中，所有的答案都在自己心裡。只有那個初心才知道歸去的方向。其實從頭到尾大家在這裡講的，都是在說服自己而不是說服別人，因為別人不重要。世界怎麼想根本不重要，可能你先生或太太怎麼想有一點重要，但最後可能你也會把他拋掉，或是你被他拋掉。總有一天自己要走上自己獨自的旅程，那一刻，你選擇什麼路、用什麼心，走到這個地方來。那個初心跟自己的生命節奏，其實蠻重要。在這裡也許你就會遇到一生一次的交會。

其實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感受，之前在主婦聯盟工作的時候，其實都市生活非常疲憊，每一次到農場找生產者、找農民，即使是聽二手的論述。都會勾起我小時候在鄉村的生活回憶，我都覺得那是充電飽滿的片刻。一直到 2000 年我回到深溝來，在這裡種我岳父的田地兩分半，但事實上我只敢種八釐地，因為我從我朋友身上知道，種菜不是開玩笑，隨便亂種下去是會種死人的。所以我就種一個我大

概可以種得了的範圍。但是每次在我做完電腦的翻譯工作之後，下午好不容易開車來這邊，陽光暖和、天氣適合下田，當夕陽西下，種得快要直不起腰時，在遠山感覺到陽光的光線、暖度、角度都是剛好灑在自己身上，彷彿天使的光芒，就會覺得「其實我就是為了這一刻才回來地種田」，我想以前人所講的「天人合一」應該就是這樣想出來的，至少我當時覺得我很接近，原來這麼累之後是這麼爽。那個土地、天和自己所構成的東西，我想我大概是被這樣拉進來的。

陳永松：我不知道青松剛剛是否有介紹到青農對於農村的夢想和願景，但很早的時候，青松也跟我提過，來農村的人會抱著一種期待，而這種期待跟實際上會有落差。包括我自己的父母親，都是在農家從事農業，但以前都是不得已的、不得不待在農村。現在這樣的時代，或許又改變了大家對於農村和農業的想像與期待。最實際的問題在於：農村有沒有辦法活下來？在農村裡面有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快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所以，談農業的問題，應該要談到說，這些對於農村與農業的想像，會不會只是自己的想像？還是有實際參與過，待過一段時間，跟著在這邊作息，才能夠真正找到自己是否適合待在農村。

陳又甄：其實我是一個都市人，只是很喜歡自然和漂亮的東西。因為家裡就是沒有自然的環境，就是想要做半農半 X 生活。因為看了一些書有接觸自然農法，知道所謂的半農半 X 這個模式。去年有在新竹一個地方學自然農法，在那邊接觸到樸門的事情，所以有去上課，因為我覺得這對我以後想要從事半農半 X 的事情應該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我現在居住的地方就是跟農離得很遠，所以就會想要了解像宜蘭或台東這些地方，了解這些前輩的經驗。

季美珍：我想問關於前面引言的簡報中，談到「農村發展政策失效」所指的是什麼事情？以及，農村是個有機體，那到底該不該干預？因為農村發展政策就是由國家介入農村的發展。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在三星行健村那邊所遇到的狀況，他們的合作社有一個規章是計畫性生產，被罵死了。那「計畫性生產」其實是工業化的大量性生產，因為沒有多餘的餘力去堆積，更何況農產品的計畫性生產的保存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對農民來講是無形的壓力。那像剛剛晏霖有提到青松是解決銷售的問題，楊文全是解決勞動力的問題，土拉客是異業結合，看起來是還不錯。但在行健村那邊遇到大豐收就會有很大的壓力，以至於他們的倉儲、冷藏不足以應付，就必須拿回自己家處理。那這是不是農業與農村發展的問題，合作社的經營到底合不合適。

黃仁志：我自己的想法是人在一起生活就是社會與空間的關係。人要在一起，就

會有「公」與「私」如何搭配的問題，「公」是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聚集在一起所要觸及或產生的公共資源，「公共」的運作是否能夠回應私人在這裡生活所遇到的問題。

台灣的「農村發展政策失效」，我自己歸結大概是兩個原因：一是我們沒有所謂的農村政策，我們有很多要放在農村的東西的政策計畫，但沒有農村政策。在我們的法令制度和規劃體系之中，有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在都市計畫中會去討論到這樣的空間配比是要滿足多少人以什麼樣的方式過生活，商業需求、產業結構，以及相對的融資計畫、財務計畫該怎麼應用。可是農村只是被當作區域計畫中的非都市土地，要做甚麼呢？就是硬體建設、水利工程、景觀設施、產銷計畫等等，可是對於放了這些東西之後要長出一個什麼樣的農村，或者說要支持什麼樣的農村生活願景，基本上是沒有這個願景在，以至於在政策上會出現大家在拼命展現我有為農村做事，卻不知道為什麼是這些事情。

第二個是我們對於農村能夠承載的活動和開放性是在轉變之中，這個轉變的過程，不管是開放性措施，或是以外來者的眼光可以看到當地人不覺得種要但卻有價值的元素。所以，政策規劃者沒有辦法去理解，在這種轉型的浪潮之中，以開放措施和實踐可能性激發出來的創生經驗，把大家聚在一起、把不同的「農周邊」活動湊在一起時，會越來越多。對於這方面，缺乏想像力也沒有相關政策。這就是我指涉的農村發展政策失效。

簡言之，就是對於農村沒有願景，只是有很多政策計畫是丟到農村中去操作，同時對於轉型的可能性缺乏一些引導和想像。對於這些草根已經看到可能性而想要回去耕耘的行動，他們是如何想到、如何看到、想要做什麼不同的嘗試，這些經驗都掌握不足。

楊文全：我對這方面的認知是，「失效」是有結構性的因素。我們的政府和產官學體系，在過去半個世紀裏面是綁在計畫生產上。但進到網路時代，新的可能性來了，就是很多個體，像我們這樣的小農，甚至沒有農業經驗也可以進場，因為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農作物賣掉。我們沒有技術，所以先種水稻，因為水稻是最簡單的，這是一個新的狀態。那，我們是農夫嗎？還是我們是糧商？因為我們也在賣米阿。

以前在計畫生產的時候，賣稻米的方式是甚至在田裏面還是濕穀的時候就賣給別人了，糧商的割稻機進來就載走了，那樣叫農夫嗎？可是我們是叫他農夫。可是我們現在是以自己銷售為主，那我們給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麼？這是很複雜的。

因為我們從在田裡工作到要做顧客管理、品項與品牌的管理都要經營。這是一個在轉型過程中非常複雜的問題。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的產官學體系是綁在慣行的農漁業運作系統中，從產量來說，這種慣行系統占台灣的絕大多數，是非常龐大的。我們這種模式可能 1%不到。所以農委會看到的就會是那 99%，也在這個架構之中去規劃政策。但這個架構，在網路時代的新動能模式是跟它背道而馳的。所以，這 99%正在萎縮。在我當農業處長的時候就知道，處裡面是不管這 1%的小農，因為所有的預算和資源都是用來處理那 99%的慣行活動。因此，這些慣行活動要如何轉型就是一個非常旁大的問題。

我去年十二月一日在台中的一個小型會議，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也在場，他講去年年底就要實施擴大農保，讓很多青年農民可以加入農保。但他又指著我說，不是你們那一種兼業農。所以，即使是現在小英總統最重要農業政策舵手，眼睛中所看到的還是叫「專業農」，要以務農維生，那專業農的定義是什麼？他訂出來說要參加農保者，一年務農所得 25 萬以上，而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參加農保。可是，我們都在這邊務農，而時代的趨勢就是有很多的都市人有農村夢，就是想要進來，但農委會不管這件事。所以這也是我看到的政策失效例子。能怪他嗎？也不能怪他，因為大象要轉彎就是很困難，高速鐵路不只難停下來，也很難瞬間轉彎。

蔡晏霖：我覺得自從有現代國家以來，農村就是一一直被干預著。我們現在走出去所看到的水田，如果沒有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去協商、規劃，像水稻這種密集度高、需要很多人共同興建水路的農作，從頭到尾要如何規劃、要流經誰的田、要如何分配水源，這件事情事實上是無法靠所謂的農村在地力量去完成。就宜蘭來說，真的沒有被干預的農村，很可能是噶瑪蘭的時期。但從漢人進到這邊來，將水稻帶進來之後，所謂的外來干預力量就一直存在。

所以，與其去想像說有沒有一個農村是沒有被干預的，不如好好地去想像什麼樣的干預是我們需要的，而什麼樣的干預是我們覺得不好的。這個就回應道先前所提的「內生性發展」的想像。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很多關於農村的發展想像是非常貧瘠的，基本上就是以都市為主來想像農村如何跟都市一樣的進步。這件事情也不能怪農村的人，因為當我們社會的整體價值觀就是偏往都市的發展狀態，資源也不斷往那樣的發展形式去聚集時，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苛責農村的人為何只想要開發、只想要賣地。回過頭來我們應該問，像之前的六都升格就會非常奇怪，

大家都拼命想要變成六都，因為只要進入六都，在財政分配上就是比其他縣市要高一階。

農村始終都是受到國家的干預。國家的干預又是「重城輕鄉」、「重工輕農」，所以大家都會想要往那個發展方向靠攏。而問題就來了，像六都是中的台中和平鄉、高雄的原住民部落，這些明明就是鄉村型態的生活方式，當他進入六都之後，發生的問題就非常多。原來是以都市集中型的國家資源和社會服務方式，在進入六都之後就併入了高雄市的社會局來進行，而偏鄉原本應該要有比較符合縣市鄉鎮尺度的規劃，就完全不見了。所以，加入六都之後，對原來偏鄉的農民或原住民，其實是出現另一種新型態的歧視，看起來好像變成台北市或高雄市的市民，但原本依照他們狀況所可以提供的國家服務就反而減少了，卻給他們所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地方創生的時候，我們也去想，到底「農村需要的是什麼？」我想這應該是這一系列的談話我們都在想的主題。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講得比較抽象一點，但也因為是抽象的概念，才可能是我們更需要的。一方面，我們需要盤點農村有哪些設施是農村需要的，但在硬體之外的軟體，有很多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原來的城鄉發展模式，就已經預設了城優先於鄉的位階，以及背後所造成的資源分配劃分問題。

另一方面，我也想問如何定義「創生」這件事？我們可能對於「創造」或「創新」，在台灣的發展模式之下，對於「創新」的想像和進行模式可能也已經很固定了。不要再談那種工業化模式的 KPI，因為這已經在城和在鄉都造成很大的問題，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看起來可能不是很有創新，比方農村的基本老人照護需求，並沒有非常創新，只是把原來農村的人照顧好。或是農村水路的維修，其實在台灣廢省之後，原來在台灣地方的農田水路、道路的維修資源就少了很多。相反的，現在是地方政府要一直寫計畫去跟中央爭取，或是透過各種莫名其妙的特別條例，才有分到一杯羹來做原本地方就需要的基礎設施維持工作。像這樣的東西是農村最基本需要的，我們的水路沒有人維修，像旱田的水路跟水利會沒有關係，所以就沒有人沒有資源去管，那誰要做？去做的人會不會被認為是在做創新的工作？其實不會。

所以，我也很想問主辦單位，今天國發會在談「地方創生」，到底我們要怎麼想像這件事，是不是一定要有亮點？會不會賺錢？或是看起來一定是要新人進來才會被叫創新？我相信台灣有很多老鄉鎮所真正需要的是可維持性的，讓原來的生活空間可以維持原來的品質而不要退化，這件事需要有人做。就像台鐵的軌道更

新和勞動力的持續補充，就是這麼基本而簡單的、維持型的、照顧型的勞動，誰要來支持、誰要來做？或者是要不要支持這些做的人？我想這是我們在討論地方創生時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黃仁志：我不知道大家對「地方創生」這個詞彙有什麼樣的感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無法區分出目前政府在使用「地方創生」跟過去使用「地方發展」的詞彙有什麼差異性。但如果我們可以把「創生」這兩個字拆開來看，也許就有一些不同的組合，可以是「創造」與「創新」，也可以是「生活」、「生計」、「生態系」。我上次拜訪青松大哥時有提到我自己外婆家嘉義六腳那邊的狀況，在去年的新聞有報導過，是全國人口老化結構排名第一的地方，那種地方該怎麼辦？另外，我爺爺老家是雲林東勢鄉，也是最近這二十年來人口減少將近一半的地方，我那些還住在那裏的堂哥也都會講，那東勢還可以怎麼辦？小孩還可以幹嘛？

青松大哥那時候跟我說了一個觀點，如果那個地方要發展起來，就是要有人看得到在那裏有討生計過生活的可能性。這後面就會牽扯到很多環節，包括對地方的想像力、地方的接納性，但除此之外，對於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到底該如何解決？那些醫療照護、文化教育的落差和不足問題、基礎設施的敗壞和缺乏維護能力。

另一方面，從「創造生態系」的概念來說，有一種是「我們這邊可以自給自足的生態系」，一種是「我們這邊團結起來可以去進佔別人市場的生態系」，到底哪個地方可以長出什麼生態系，這就跟種田一樣，每塊田都有他的個性，每個地方也都有他自己的特性。可能是地方的地理位置、人文水土、社群文化等等，在那個地方能夠長出什麼生態系也需要支持，支持每個地方都有更多機會去長出自己的生態系，支持人在其中是活得下去、有機會創造自己活的樣貌。這個機會和技術問題的解決，才是地方創生的基本工作，而不是由上而下地，或是憑特資本的介入，直接賦予地方某種角色或發展模式。因此，是要支持人返鄉耕耘家鄉這段旅程所需要的支持。

季美珍：前幾天在政大討論「地方創生」與「農村創生」之間是否有疊床架屋的問題，我看了日本與台灣的資料。如果大家去看國發會所談的地方創生，他是希望在 2030 年台灣的人口可以停在 2000 萬，不要再跌破 2000 萬。日本是保持一億的人口。東協現在是人口紅利，而台灣沒有這個紅利，所以國家需要關注。我自己體會到的是，年輕人可以到農村去做很多東西，創造工作、創造能力。我要特別提，農民並不是 24 小時都從事農業，但工程師可能 24 小時都在當工程師，上下班、生活睡覺都在想。可是，是不是一定要拿著鋤頭才能叫專業農？過

去對於「專業農」的定義，現在需要有不同的論述。所以用這種方式來看農保是非常奇怪的。像勞保，就會你是兼職兩個小時、四個小時，還是有勞保，但為什麼農民不是，這就很奇怪。

賴青松：我聽到現在終於弄清楚一件事情，問題看起來在國家，不在農夫。剛剛講了半天，講不出話來都是用國家角度去思考時，國家卡住了。因為國家的邏輯是無法套用在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上，就很難適用了。其實，台灣有一項農產品是國家根本沒在管的，就是「檳榔」。「檳榔」在農委會的紀錄中根本就沒有去追蹤，它就是被當作根本就不該種的東西，想辦法消滅它。而在沒消滅之前，就是土匪梁山泊，但是這樣農產品從來沒有崩盤過，產量從來沒發生問題、種植戶一直都有飯吃也不曾上街抗議，因為民間的自治管理有一個「檳榔生產總會」，差不多就是天地會。沒有國家介入的農產品根本沒有問題，國家介入的農產品每次都發生問題。

陳永松：回應晏霖剛剛提到的，偏鄉現在有很多水路的問題是確實存在的。但我現在所看的，如果創生是要把好的東西保留下來，可現在反而是我們的水圳都在做水泥化的工程。因為我自己是念海洋、做水產，我就想有沒有機會讓我們的台灣蜆回到農田水圳之中。但現在所看到的是，水路都在做三面光的工程。如果說創生是要跟所有的單位做連結，這種事情難道沒有辦法做更好的友善的策略嗎？

賴青松：其實有問題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開始。回到深溝這個地方來說，它是個特例但還是有些通則，簡單的說就是「聚眾知識、眾志成城」，不是政府創造的亮點，而是一個地方的一群人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來讓大家集中。只有讓大家覺得這裡有意思，自發地跑來的時候，不用預算補助、不用設備加強，也不需要任何的誘因導入，因為這些有趣的人會帶著他的青春、熱情、資本、人脈到這個地方來。有動機處夢想才開。其實深溝不是我刻意形成的，我從頭到尾都在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所以我會非常的意志堅定，因為我必須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然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或其他鄰居會幫我解決問題，所以我會非常努力去做這件事。但，如果一個地方能夠確實累積出一個穿破點時，那個破口產生時，就會讓原本所有在體制中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所以，剛剛陳老師所提到的事情，像旁邊這條馬路，十年前我們剛來時，村子裡的鄉民代表就去找過立法委員，說選舉到了，要把這條原本兩線道的路擴寬拉直為四線道。其實政客根本沒有好好想過，只是直覺地認為是馬路就要變寬拉直、是房子就要變大、沒有的東西就要長出來、容易壞的就要弄成不會壞的，大概就

是只有這個原則，因為沒有步數只好這樣照套公式。那時候我進了深溝國小當家長會長，在地唯二的意見領袖就來找我們這些外來者，因為在地很難找到願意抵擋在地政治人物的意見。所以我們就一搭一唱去找在地立法委員，自己開了好幾次會、把資料報表弄出來去找縣政府工務局的人，那時他們要把這條路做成林蔭大道的計畫都已經做出來了。那時候住在這裡的意見領袖，也是現在深溝國小校友會的總幹事，就說有沒有替住在這邊的人想過，擴寬拉直從兩線道變四線道後，車速馬上從五十變成八十，原本在路上散步的老人家會不會有危險？可是在地人沒有想到這個事情，就只有想到政治人物說馬路變大，好像還不錯。但是如果沒有聚眾，這種抵擋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還有一次，本來深溝國小旁邊這兩條水圳都要做成三面光，但是田在後面的人說吃不到水，會漏水。但又是找上我們這群在地方「沒臉沒皮」的外地人，就是喜歡友善農耕、喜歡水溝裡有魚有蜆，所以只要有相關的訊息在臉書上發出來，在地的有志之士就聚起來，把外面的人拉進來，在現場跟水利會的小組長跟科長溝通，就把原本只為了幾段容易崩塌而有兩、三戶人家有意見的整體改造工程給改變了。當在地沒有人有思維去把這些人流帶進來時，根本事情就不會發生。但如果是現在這樣運作下去，三年、五年、十年之後，深溝的人就會有事可以說，就會看到有新思維的人是隨著時間增長擴散而又聚集的。所以，必須先造成群聚、穿破，接下來示範和擴散出去。其實每個人都該帶著自己的夢想回到自己的地方。這是可能的，而且已經在發生了。